



The Wisdom of Confucius

孔子的智慧

黄嘉德译

林语堂著



目录

译者序 / 001

第一章 导言 / 001

孔子思想的特性 / 003

孔子的品格述略 / 018

本书的取材及计划 / 031

第二章 孔子传 / 037

（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 / 039

世系，童年，青年 / 040

三十岁至五十岁 / 042

掌大权时期 / 045

五年漂泊 / 048

厄于陈蔡 / 053

再度漂泊 / 056

孔子之治学与生活习惯 / 058

孔子逝世 / 061

附：《孔子世家》白话翻译 / 063

第三章 《中庸》 / 093

（原为《礼记》第三十一章） / 095

第四章 《大学》 / 125

第五章 《论语》 / 143

第六章 论以六艺施教 / 169

（《礼记》——《经解》第二十六） / 171

第七章 《哀公问》 / 179

第八章 理想社会 / 189

（《礼记》第九——《礼运》） / 191

第九章 论教育 / 205

（《礼记·学记》） / 207

第十章 论音乐 / 219

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 / 221

第十一章 《孟子》 / 235

（《告子》篇） / 237

译者序

《孔子的智慧》(The Wisdom of Confucius)，系语堂先生向西方读者介绍孔子思想之作，列入美国“现代丛书”(The Modern Library)，全书约三百页，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。

本书共分十一章如下：

第一章为林氏之导言，为本书重要部分。本章向西方读者介绍并阐释孔子之思想、人品、风貌。

第二章为孔子传，完全为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本文。但分为若干章节，并予标题，以便查阅。

第三章为《中庸》原文，也分节标题。

第四章为《大学》原文，也分节标题。

第五章为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著作。其中一部分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弟子的话。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孔门语录，如今我们所见的《论语》是杂乱无章的，也许是秦始皇焚书后，汉儒据记忆写出，未经分题编辑的缘故。本书作者选辑《论语》中与孔子关系重要的部分，分为十类，并予标题，以醒眉目。计为：(一)孔子风貌；(二)孔子的艺术生活；(三)孔子谈话的风格；(四)孔子谈话的霸气；(五)孔子的智慧与机智；(六)孔子的人道精神(论仁)；(七)君子与小人；(八)中庸及乡愿；(九)为政之道；(十)教育、礼与诗。

第六章为孔门教育六科——六艺。

第七章为孔子与哀公论政，选自《礼记·哀公问》。

第八章为《礼记·礼运·大同篇》，是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憧憬。

第九章为孔子论教育，选自《礼记·学记》。

第十章为孔子论音乐，选自《礼记·乐记》。

第十一章

为《孟子》一书中的《告子上》，以孔门大儒孟子论性善为本书作结。

译者译毕本书之后，心中有两个感想起伏不已，久不消逝。

第一是关于孔子的印象：孔子经过汉宋儒家尊崇神化之后，弄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泥胎木偶，失去人性，令人敬而远之的超人——圣人，可能没有什么人愿做他老人家的芳邻了。语堂先生这本书把孔子恢复成有血肉之躯的人，使人觉得他老人家颇可亲近，想到他周游列国，因为坚持理想，不附和流俗，处处坎坷不遇，一生遭人冷落，不由得为他鼻酸，因而觉得孔子是个可爱的智者，也是个极富美感的艺术家。可以说语堂先生把孔子从九天之上接回到了人间，这是件可喜的事。

第二是关于林语堂先生本人。林先生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在上海办《人间世》小品文半月刊、《宇宙风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西风》时，在文字上反对左派欧化文体，提倡公安三袁的干净清新的语录体，在思想上提倡自由主义，结果遭左派文人反对。在守旧一派文人学者中，甚至直到今日，仍有人以语堂先生虽精于英文，但不邃于国学，因而讥诮之。林著《中国传奇小说》、《京华烟云》、《红牡丹》这些纯文学著作姑且不说，先生根据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著的《武则天传》及稍后根据宋后诸多中文著作而创作出的《苏东坡传》(The Gay Genius)，我想讥诮语堂先生不邃于国学的腐儒是从未读过的。至于有关中国经学的本书《孔子的智慧》，语堂先生对孔子有崭新的看法，殊不寻常。另外还有《老子的智慧》，更是他们所未浏览过的。当然这些书都是英文著作，对英文修养欠缺的人，说句有些失敬的话，真是“夏虫不足以语冰”。另外，本书英文版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。当时林先生在导言里提出两点，颇具眼光。一、孔子的封建思想虽已陈腐不切实际，孔子主张的个人道德修养，仍是今日社会生活上所不可或缺的。这是孔子学说的伟大价值。二、孔子的学说是顺乎人性的，这话是在四十多年前说的。这等话说出来似属平常，其实太不平常了。

最后，本书英文原著不过三百页，除书前林氏一篇洋洋万言的序言，及其余各章前小序外，则为孔门经典的原文英译。除《中庸》一书为辜鸿铭之英译外，其余《孔子世家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，及《礼记》中各篇皆为林氏英译。本书内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礼记》中各章之原文外，为一般读者易于阅读计，皆附有语体译文。《论语》及《孟子·告子篇》，较为普通，白话译文不难见到，未附语译。

关于本书汉译经过是这样：

一九八一年夏赴美国檀岛家中小住两月，原拟在此两月中将本书汉译完毕，殊不料必须查考之处颇多。九月末返台后始正式汉译，直至一九八二年三月初始大致杀青。又细心整理，费时几将两月，因系经典汉译，查证斟酌之处极多，因而延误排印，屡劳读者催促，至为歉咎，尚祈鉴谅为感。

又本书系哲学论著，属于中国经典范畴。译者学养不足，译笔有误时，与原作者语堂先生无关，幸明察焉。

译者张振玉识

一九八二年三月于台北复旦桥畔

第一章 导言

一 孔子思想的特性

时至今日，还能有人热衷儒家思想吗？若说是有，岂非怪事？其实这全系于人对善念是否还肯执著，而对善念一般人是不会有一股狂热的。更重要的，似乎是今日人是否对儒家思想还存有信心。这对现代的中国人特别重要。这个问题是直接指向现代的中国人，而挥之不去，也无从拒绝的。因为现代甚至有些中国人，曾经留学外国，思想已趋成熟，他们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与观点，都显得心悦诚服。由此我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，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的。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，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。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间政治混乱、思想分歧的时期，儒家思想战胜了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自然派思想，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学派。在两千五百年内中国人始终奉之为天经地义，虽然有时际遇稍衰，但终必衰而复振，而且声势益隆。与儒家思想抗衡者，除道家在纪元后第三至第六世纪盛行之外，其强敌莫过于佛教，佛教多受宋儒所宗仰。佛教虽无玄妙精微，在儒家人道精神及知识论的阐述上，也只能予以修正，然后即将重点移至儒家经典所已有之某些观念上，而予以更充分之重视，但也并不能将儒家思想根本推翻。这也许是纯由于孔子个人多年来的声望地位使然，但是儒家心中非凡的自负，对本门学说精当之信而不移，因而鄙弃佛教理论而侧目视之，或者始予宽容，当时的情形可能正是如此。儒家也以平实的看法否定了庄子的神秘思想，也以此等平实的思想鄙弃了佛教的神秘思想。今天，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，但并不是基督教，而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，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，这种西方文明全是工业时代所引起的。儒家思想，若看做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，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，被人视为陈旧无用；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，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，未免失当。我认为儒家思想，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儒家思想，在中

国人的生活上，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，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。西方人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，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，会受益不浅的。

在西方读者看来，孔子只是一位智者，开口不是格言，便是警句，这种看法，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。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，纯靠一套格言警句，而支配一个国家，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，是办不到的。孔夫子的威望与影响如此之大，对此一疑难问题之解答，必须另自他处寻求才是。若没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，纵有格言警句，也会久而陈腐令人生厌的。《论语》这部书，是孔学上的圣经，是一套道德的教训，使西方人对孔子之有所知，主要就是靠这部书。但是《论语》毕竟只是夫子自道的一套精粹语录，而且文句零散，多失其位次，因此若想获得更为充分之阐释，反须要依赖《孟子》、《礼记》等书。孔子总不会天天只说些零星断片的话吧。所以，对孔子的思想之整体系统若没有全盘的了解，欲求充分了解何以孔子有如此的威望及影响，那真是缘木求鱼了。

简截地说，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，以伦理为法，以个人修养为本，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，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。由此看来，最为耐人深思之特点是在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。其方法为一伦理性之方法，与法家以讲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。孔子的学说也是断然肯定的，要求人对于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，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，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不相同。实际上，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，对全无实用虚无飘渺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，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，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？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“人的标准就是人”。就凭这条教义，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。并不必在什么神祇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。

更精确点儿说，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，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，儒家思想当然主张阶级分明。要了解这种情形，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。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，各自独立，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，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。周朝皇帝名为华夏君王，统治全国，实则徒拥虚名，衰微已极。甚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，虽周游列国，干谒诸侯，求其施仁政，拯百姓于水火，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。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，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。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，周室衰微，帝国荏弱，纵然前往朝见，终无大用。各国间虽订有条约，转眼粉碎，结盟和好，终难持久。养兵日众，捐税日增，强凌弱，众暴寡。国与国间随时会商，真是舌敝唇焦，不见成功。学人智者开始订攻守之计、和战之策，别利害，辨得失。说来也怪，当时学者智士之间，国界之分渐渐泯灭，周游列国，朝秦暮楚，亲疏无常。而古礼失尊卑乱，贫富悬殊，政教乖误，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，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。在此种气氛中，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，智慧明敏之士，遂各抒己见，如百花齐放，竞妍争香，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。或蔑弃礼教如老庄；或主张人人当亲工作以谋生，如萌芽期之共产主义如许行及其门人；墨子则倡单一神祇，崇爱上帝，教人重人道、勿自私，甚至窒欲苦行，竟趋乎极端而排斥音乐；此外尚有诡辩家、苦行家、快乐主义者、自然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。于是，不少人，如今日之欧洲人一样，开始对文化表示怀疑，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，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丛林中或到爪哇以东之巴利岛一样。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，他相信道德的力量，相信教育的力量，相信学术的力量，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，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，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。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。

在《礼记·儒行》篇里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其他各派的差异。“儒”这个字，在孔子时便已流行，而称为儒的一派学者，大概是特

别的一批人。他们在观点上持保守态度，精研经史，其儒冠儒服正表示他们对古代文化的信而不疑。下面的几段摘录文字足以表示儒家的高度道德理想。

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夫子之服，其儒服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；长居宋，冠章甫之冠。丘闻之也，君子之学也博，其服也乡，丘不知儒服。”

哀公曰：“敢问儒行？”孔子对曰：“遽数之不能终其物，悉数之乃留，更仆未可终也。”哀公命席，孔子侍曰：“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，夙夜强学以待问。怀忠信以待举，力行以待取。其自立有如此者。

“儒有衣冠中，动作慎，其大让如慢，小让如伪；大则如威，小则如愧。其难进而易退也，粥粥若无能也。其容貌有如此者。”

“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，可近而不可迫也，可杀而不可辱也。其居处不淫，其饮食不溇，其过失可微辨，而不可面数也。其刚毅有如此者。”

“儒有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。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适弗逢世，上弗援，下弗推。谗谄之民，有比党而危之者，身可危也，而志不可夺也。虽危起居，竟信其志，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。其忧思有如此者。

“儒有博学而不穷，笃行而不倦，幽居而不淫，上通而不困。礼之以和为贵，忠信之美，优游之法，慕贤而容众，毁方而瓦合。其宽裕有如此者。”

在此等列国纷争、王室陵夷、封建制度日趋崩溃之际，孔子的教义自然不难了解，尤其是孔子以礼乐恢复封建社会的用心之所在。孔子的教义我认为含有五项特点，对于了解儒家教义至为重要。

（一）政治与伦理的合一

孔子特别重视礼乐，关心道德这些方面，西方人往往不甚了解。可是把孔子心目中的社会秩序表现得更好，再没有别的字眼儿比“礼乐”一词更恰当了。孔子回答弟子问为政之道时说（子张问政，子曰）：

“师乎，前吾语汝乎？君子明于礼乐，举而错之而已。”（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。见《礼记》第二十八“仲尼燕居”。）听孔子说这种话，似乎过于幼稚天真。其实从孔子的观点看，这也容易了解。我们若记得孔子对“政”的定义是“政者正也”，自然不难了。换言之，孔子所致力者是将社会之治安置于道德基础之上，政治之上轨道自然也由此而来。《论语》上有这样的对话：

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

换言之，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，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，因此管理社会的政府已然没有必要。这个意思在这几句话里，也暗示出来，他说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，使无讼乎？”但是，如何才可以达到此等无讼的地步呢？他在后文里另有说明。但是切莫误解的是，孔子为政最后的目的与刑罚礼乐的目的是相同的。在《礼记·乐记》中说：

礼以道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礼乐刑政，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

孔子从不满足于由严刑峻法所获致的政治上的秩序，他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在政治上孔子认为有两种等级，他曾说，齐国再往前进步，就达到鲁国的文化程度，也就是达到了第一阶段的治世；鲁国若再往前进一步，就达到了真正文明的地步，也就是达到了第二阶段的治世。

（二）礼——理性化的社会

儒家思想，在中国也称之为“孔教”、“儒教”，或是“礼教”。西洋的读者会立刻觉得礼字的含义比纯粹的礼仪要复杂得多，或者觉得孔子的思想是一套假道理。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严正从事，因为“礼乐”一词在孔门著作里屡见不鲜，似乎包括孔子对社会的整套制度，正如“仁”字似乎包括了孔子对个人行为的教训精髓一样。“礼乐”一词的精义及其重要性，在本书第六、七、八三章将有详尽的讨

论。现在只需要指出孔子自己对“政”与“礼”的定义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政是“正”，而礼则是“事之治也”（见《礼记》第二十八）。中国这个“礼”字是无法用英文中的一个词表示的。在狭义上看，这个词的意思是“典礼”（Ritual），也是“礼节”（Propriety），但从广义上看，其含义只是“礼貌”（Good Manners）；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，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，万事万物各得其宜，所指尤其是合理中节的封建社会。如前所述，当时的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当中。

孔子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乃致力于恢复一种社会秩序，此种社会必须人人相爱，尊敬当权者。在社会上公众的拜祭喜庆，必须表现在礼乐上。当然，这种拜祭的典礼一定是原始的宗教典礼，不过我们所谓的“礼教”，其特点为半宗教性质，因为皇帝祭天，这是宗教性质的一面，但在另一面则是教导百姓在家庭生活上，要仁爱、守法、敬长辈。在祭天、祭当权者的祖先、祭地、祭河川、祭山岳，这等宗教性的祭祀则各有不同。在《论语》与《礼记》上有若干次记载，记孔子并不知道这些祭天与皇室祖先的意义，如果知道，则治天下便易如反掌了。在这方面，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，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，则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。儒家所倡的礼，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，是包括宗教的法规，也包括生活的规范的，而且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。孔子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，他是生活在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德（Comte）所说的“宗教的”时代。

再者，设若孔子是个基督徒，毫无疑问，他在气质上，一定是个“高教会派”的教士（High Churchman——英国国教中，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之一派），不然便是圣公会教士（Episcopalian），或是个天主教徒。孔子喜爱祭祀崇拜的仪式，所谓“我爱其礼”，当然不只是把仪式看做缺乏意义的形式，而是他清楚了解人类的心理，正式的仪礼会使人心中产生虔敬之意。而且，正像圣公会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一样，

孔子也是一个保守派的哲人，相信权威有其价值，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。他的艺术的美感十分强烈，必然是会受礼乐的感动，《论语》上此种证明很多（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《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》）。祭天与皇室的祭祖会引起一种孝敬之感，同样，宴饮骑射在乡村举行时，伴以歌舞跪拜，会使乡人在庆祝之时遵礼仪守秩序，在群众之中这也是礼仪的训练。

所以，从心理上说，礼乐的功用正复相同。儒家思想更赋予礼乐歌舞以诗歌的优美。我们试想孔子本人就爱好音乐，二十九岁就从音乐名家学弹奏乐器，并且虽在忧患之中，也时常弹琴自娱，因此，他对礼乐并重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孔子时代的六艺，在孔门经典中清清楚楚指出为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孔子在六十四岁时，删定《诗经》，据说经过孔子编辑之后，其中的诗歌才算分类到各得其所，而且各自配上适当的音乐。事实上，据记载，孔子自己讲学的学校，似乎不断有弦歌之声。子游为武城宰时，开始教百姓歌唱，孔子闻之欣然而笑，并且向子游开玩笑。见《论语·阳货》第十七：

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

礼乐的哲学要义由《礼记·乐记》可见：

“观其舞，知其德。”（见一国之舞，知其国民之品德。）

“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。”（音乐发自内心，礼仪生自社会。）

“乐者，乐也。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”（音乐表喜乐之感，此种情绪既不能抑而止之，又不能以他物代替之。）

“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。”（音乐代表天，是抽象的；礼仪代表地，是具象的。）

礼教的整个系统是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，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，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，宴饮骑射的规则，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，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。将孔子的这门真实学问发扬得最好的

莫若荀子。荀子与孟子同时，在学术上为孟子的敌人，其哲学思想在《礼记》一书有充分之阐述，足以反映荀子之见解（见本书第六、七、八章）。

对礼之重要有所了解，也有助于对孔子另一教义的结论之了解，即“正名”一说。孔子把他的当代及他以前两百年的政治历史写成《春秋》，其用意即在以“正名”为手段，而求恢复社会之正常秩序。比如，帝王处死一叛将曰“杀”之，王公或将相杀死其元首曰“弑”之。再如春秋那些国里，非王而自称王者，孔子仍以其原有合法之头衔称之，即所以示贬也。

（三）仁

孔子的哲学精义，我觉得是在他认定“人的标准是人”这一点上。设非如此，则整个儿一套儒家的伦理学说就完全破产，亦毫无实行的价值了。儒家整套的礼乐哲学只是“正心”而已，而神的国度正是在人心之中。所以，个人若打算“修身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。这就是孔子伦理哲学之精义。其结果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见本书第三章《中庸》）。关于“仁”，孔子有极精极高的涵义，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及三个历史人物之外，他是绝不肯以“仁”这个字轻予许可的。有时，有人问他某人可否算得上“仁”，十之八九他不肯以此字称呼当世的人。在本书《中庸》一章里，孔子指出“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。他有一次说，孝悌即为仁之本。

“仁”一字之不易译为英文，正如“礼”字相同。中文的“仁”字分开为二人，即表示其意义为人际关系。今日此字之读法同“人”，但在古代其读音虽亦与“仁”相同，但只限于特殊词中，汉代经学家曾有引证，今日已无从辨别。在孔门经典中，“仁”这个字与今日之“人”字，在用法上已可交换，在《论语》一书还有明显的例证。在《雍也》篇：宰我问曰：“仁者，虽告之曰‘井有仁焉’，其从之也？”足见“仁”与“人”在这里通用。

由此可见，“仁”与“人”之间的联想是显然可见的。在英文里，human, humane, humanitarian, humanity 这些字，其中最后一字就含有 mankind 和 kindness 两字的意思。孔子与孟子二人都曾把“仁”字解释做“爱人”。但是此事并不如此简单。第一，如我所说，孔子不肯把“仁”字用来具体指某个真人，同时，他也未曾拒绝举个“仁人”的实例。第二，他常把这个“仁”字描写做一种心境，描写做人所“追寻”、所“获得”的状态，心情宁静时的感受，心情中失去“仁”以后的情况，心中“依于仁”的感受。而孟子则曾说“居于仁”，好像“居于室”中一样。

所以，“仁”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。准乎此，孟子开始其整套的人性哲学的精义，而达到人性善的学说。而荀子相信人性恶，关于教育、音乐、社会秩序，更进而到制度与德行上，则走了孔子学说的另一端，发展了“礼”字的观念，而置其重心在“约束”上。在普通英文的用语里，我们说我们的相识之中谁是一个 real man 或 realperson，此词的含义则极为接近“仁”字。一方面，我们现在渐渐了解何以孔子不肯把“仁”这个徽章给予他当代那些好人而称之为仁者，而我们今天则愿意把 realman, realperson 一词最高的含义给予我们的同代人(林肯自然是当之无愧的)。另一方面，依我们看来，一个人做人接近到“仁人”的地步并不那么困难，而且只要人自己心放得正，看不起那些伪善言行，只要想做“真人”，做个“仁人”，他都可以办得到。孔子都说人若打算做个“仁人”，只要先做好儿女、好子弟、好国民，就可以了。我们的说法不是和孔孟的说法完全相符吗？我以为，我把中国的“仁”字译成英文的 trueness 是十分精确而适宜的。有时，只要译成 kindness 就可以，正如“礼”字在有些地方可以译做 ritual(典礼), ceremony(仪式), manners(礼貌)。

实际上，孟子的理论已然发展到人性本善，已是人人生而相同的了，他还说“人人可以为尧舜”，也正是此义之引伸。儒家说“登高

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，将此种近乎人情的方法用在德行方面，从平易平凡的程度开始，这一点足以说明其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可爱之处，正好不同于墨子的严峻的“父道”（Fatherhood）与“兼爱”（兼爱之说与基督的道理那么相近）。儒家有合乎人情的思想，才演变出以人作为人的标准这条道理。这样，不仅使人发现了真正的自己，使人能够自知，也自然推论出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恕道。孔子不仅以此作为“真人”、“仁人”的定义，并且说他的学说是以恕道为中心的。“恕”字是由“如”与“心”二字构成的。在现代中文里，“恕”字常做“饶恕”讲，所以有如此的引申是不难看出的。因为，你若认为在同一境况下，人的反应是相同的，你若与别人易地而处，你自然会持饶恕的态度。孔子就常常自己推己及人。最好的比喻是：一个木匠想做一个斧子的把柄，他只要看看自己手中那把斧子的把柄就够了，他无须另求标准。人就是人的标准，所谓推己及人是也。

（四）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

儒家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伦理方法已然讲解清楚。最简而明的说法是：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孙、仁爱的弟兄所构成的国家，一定是个井井有条、安宁治安的社会。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，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。这种说法颇类似现代教育家所说，现在天下大乱在于教育失败一样。把世界秩序作为最终目的，把个人修身作为基本的开始，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，在本书《伦理与政治》1一章中有详明的叙述。可再参阅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各章。中国人对格言谚语的重视，由此看来，自然不难明白，因为那些格言谚语并非彼此独立毫无关联，而是一套内容丰富面面俱到的哲学。

1 编者按：即本书第四章《大学》。

从现代心理学上看，这条道理可以分而为二，就是习惯说与模仿说。对孝道的重视（我不妨译做“当好儿女”）是以习惯说为其基础的。孔子、孟子都分明说，在家养成了敬爱的习惯，将来对别人的父母与兄长也一定会恭敬，对国家的元首也会敬爱。本书第四章中有：家家

习于仁爱，则全国必习于仁爱；家家习于礼让，则全国必习于礼让。假使弟子敬爱父母兄长及尊敬长辈，必在成长后为良善国民奠定正确的心态与道德的基础。

（五）士

模仿学说，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，产生了知识阶级与“贤人政治”。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，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，否则便失去其为上层阶级的资格了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君子”的含义，是尽人皆知的。孔子所说的“君子”，绝不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“超人”。君子只是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，他同时好学深思，泰然从容，无时无刻谨言慎行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，为民楷模，必能影响社会。不论个人处境如何，无时不怡然自得，对奢侈豪华，恒存几分鄙视之心。孔子的道德教训全表现在绅士身上。中文里的“君子”一词，在孔子时已然流行，只是孔子另赋以新义而已。在有些地方，其过去的含义与“君王”相同，绝不可译成英文中之 gentleman；在其他地方，其含义显然是指有教养的绅士。由于有士大夫这种上层阶级，“君子”一词的两种含义便互相混合了，其所形成的意思，颇类似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“哲人帝王”。关于以身作则，或者说是身教，其力量如何，这种学说在《论语·述而》篇有充分的讨论。对于道德行为之影响力量，孔子是过于自信。有一次，一个贪官季康子告诉孔子，他国内盗匪横行，窃贼猖獗，他深以为忧，孔子很直率地告诉他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（你本人若不贪，你赏窃贼让他去偷窃，他也不会去的。）

二 孔子的品格述略

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，以及再往后的中国历史上，孔子本人的声望之高及其遗教地位之隆，要归之三个因素。第一，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特具吸引力；第二，中国古典学术与历史知识为孔门学人所专有，而当时其他学派对中国古典及历史则不屑一顾。同时，中国此等古代